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

以魯迅為界面的當代中國思想界：錢理群，王曉明，汪暉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9-056-MY3

執行期間：98年08月01日至101年0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陳光興

計畫參與人員：劉雅芳、胡清雅、蘇淑冠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9 日

以魯迅為界面的當代中國思想界：錢理群，王曉明，汪暉

第三年進度與總結報告

一、 摘要

本案的研究焦點為探論當代中國大陸思想界如何透過魯迅來展開，以思想界代表性人物、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王曉明、汪暉為研究的對象。第三年以汪暉為研究重點，集中在「魯迅左翼」的思想性討論。

關鍵字：魯迅、左翼、錢理群、王曉明、汪暉

二、 報告內容

本報告分成兩個部分，一是針對第三年研究焦點汪暉部分，一是三年來整體總結報告。

(一) 汪暉部分：

汪暉早期從事魯迅研究，《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為其博士論文（1988年完成），可視為汪暉早期魯迅研究的標誌。之後汪暉的思考轉入思想史領域，從魯迅進入五四啟蒙時期，其研究工作轉向現代中國思想，於1989年發表〈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一文，分析「五四」運動的歷史、社會條件與思想內涵。

1990年代，汪暉與陳平原、王守常創辦《學人》叢刊，後又擔任19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重要刊物《讀書》的主編（1996-2007），任職期間，《讀書》成為中國思想交流的主要平台。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爆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外界多將汪暉作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汪暉出版《死火重溫》，收集過去多發表於《學人》雜誌的評論，當中以魯迅作的文學政治觀作為基底，前溯宋明理學至清末民初，討論中國現代性的作用與當代中國思想問題，以進入對於1990年代學術狀況的討論與批判；而這段時期的思想結晶收錄於2004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

汪暉之所以被視為新左派知識分子，原因之一是他從中國近代歷史包括宋明理學的思想領域進入，分析當代大陸的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並進行批判；他對於20世紀中國革命抱持了正面態度，希望從包括文革在內的革命與社會主義遺產中，進行反思並繼承。也因此，汪暉比一般學者更多地討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史。2008年《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一書出版，收錄汪暉於1994至2007年間發表的文章，汪暉特別標示了「90年代」，背後他對於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時期的近代歷史的基本分析架構：中國於1980年代形成市場經濟，以社會主義自我改革的形式所展開的革命世紀到了尾聲，而1990年代的開展，則是以革命世紀的終結作為標示的。也就是說，對於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經驗的評估，是他擷取批判當下的重要思想資源；他著重中共建

國（革命黨的建制化）直到文革前三年（對於建國後建制化問題的提出與試圖打破），以及文革後期（黨國體制的再建制化，以為改革開放做準備），以至 1970 年代末期，中國能在脫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後重新銜接上。

近年，汪暉思想史以重新介入當代問題，並同時注重當代國家間體系下的「區域」的歷史性與結構性；他將「亞洲」納入他的思想架構、並探求中國前現代國家形式與周邊關係，相關討論收在 2010 年出版的《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一書中；2011 年春，汪暉應本所邀請來台灣交通大學進行客座，即以書名為題，進行八回客座講課。以下以二主題項目，針對汪暉的講座重點，進行討論。

活的文本：關於啟蒙

「啟蒙」是五四時期的重要關鍵詞。汪暉以魯迅發表於 1908 年的〈破惡聲論〉一文，討論「形式」與「內容」的政治性。魯迅此文的撰寫並非當時知識分子倡議的「白話文」，也非當時飽受批判的「文言文」，而是「古文」。以古文對比白話文、文言文，形斷裂書寫，閱讀的障礙成了「形式」問題，也提出了形式的政治性可能。也就是說，汪暉認為新的創造性存在於對於形式的挑戰裡頭，而魯迅〈破惡聲論〉的書寫形式形成了「敘述的空缺」，因而保存了後人徵候性閱讀的可能。

汪暉在此提出一個方法論。他提出，「政治性」的可能，發生在對於「形式」的創造性破壞上，而魯迅在他的文本中埋了這個線索。魯迅此文的表意不僅是語言（內容）上的，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各種象徵進步、啟蒙的眾聲喧嘩中，此文以「古文」的文本形式出現，冒著在當時恐被理解為章太炎等「國粹派」的風險，事實上「古文」的書寫也不為當時的國粹派所使用，魯迅以「古文」談「啟蒙」，基本上就是一個形式與內容上悖論、是一個語言邊界的打破與創造，而汪暉認為，魯迅的政治性隱藏在當中。於是〈破惡聲論〉在那個年代的眾多啟蒙文本中，形成一個突出的「不連續」、「斷裂」。簡單的說，就是相當礙眼、不知道如何放置到當代思想脈絡之中：魯迅明明談啟蒙，但論者不能把他等同於胡適；他採取像是文言文的語言形式，但也不能把他當做衛道國粹派；他在文中談民族主義，但他的「獸性愛國」說又使他不同於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魯迅也談跨越國界串連，但他又批判無政府主義與世界主義。於是，魯迅成為一個反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反世界主義的世界主義者，成為當代知識分子中的不和諧，卻也因此百年之後，保留了異質的、得以深掘的思想資源。

從魯迅此文可以開展的政治哲學問題眾多，諸如美學作為去權力關係的啟蒙的可能、個體與集體、形式與內容、人的內在性等，更在中國 19、20 世紀經驗中內在於歷史的提出了一些問題與解答，汪暉看到此文本的不連續性與脫序，嘗試將文本歷史化、從既定的歷史敘述中搶出來，並從中看到對於當代的提問，活的文本之意，在於其政治性批判至今有效，他提供當今對於五四時期思想狀況的理解渠道、是相對化的參照。

在關於「啟蒙」問題的討論上，汪暉另外舉了魯迅的〈阿Q正傳〉作為文本，以「阿Q的六個瞬間——紀念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為題，進行討論。演講中，汪暉以同樣的文本

詮釋形式作為方法，提出當前對於〈阿Q正傳〉的兩種解讀傳統（一是寫實主義，亦即將阿Q作為受壓迫農民原型，從而連接阿Q加入造反派；另一是預言性質的將阿Q理解為作為「國民性」批判的原型），從而導向關於啟蒙的現代性提問。這兩種讀法，至今衍生出許多經典問題：作為文學作品的敘述方式，在阿Q性格的描繪上，是否產生斷裂？阿Q究竟是中國人的國民性代表，還是農民階級的思想特徵？阿Q有可能成為革命的主體嗎？參加革命黨的阿Q，和國民性批判典型的阿Q，如何連接？

汪暉首先提出阿Q的兩個片段，包括阿Q被處死前對於「觀看」旁觀者的內心獨白，以及阿Q突然產生類似「什麼都不想要」的關於自我意義的思考。阿Q身上突然出現類似於「覺醒」知識分子式的思考，過去多將此視為作者魯迅的知識分子身分的介入、而造成文本中文字的不連貫性，但汪暉則將這兩段「阿Q不像過去阿Q」的文字，認識為文本的斷裂，顯示魯迅在討論人之自我覺醒的可能性。汪暉認為，魯迅藉由不連續性，提出了，諸如「革命」的歷史事件，會產生時代氛圍，而這種歷史的時代氛圍，是「個體」在不依靠有權者而產生自我覺醒的可能性之一，也就是歷史中眾多因素（包括先諸多前革命者的抵抗）累積於個體的「內在性」。於是「形式」與「內容」的問題，再度於魯迅的〈阿Q正傳〉裡被作為問題意識而提出——魯迅是用文本的不連貫作為方式而展開相關人的覺醒的討論。也就是說，「形式」作為魯迅在文字以外進行表意的語言方式。

綜觀汪暉提及的「六個瞬間」，包括了阿Q的「失敗的痛苦」、「無所適從」、「飢餓與性」、「生存的突破」、「革命的本能與『無聊』」、「大團員與死」，亦即魯迅為阿Q作「傳」，實為描述一個在社會等級秩序底層、感受到時代變動卻不明白自身與其關連的個體，其「無所適從」既有外部條件之因，但卻暗示了讀者阿Q絕非「既定」類型（如同國民性之批判），而是一個正在發展的人格，而個人的發展與時代變動的契機密切相關，亦即，究竟在革命發生與阿Q的革命發生時，阿Q的生命將產生什麼新的素質？從此，若將阿Q的精神勝利法視作對於「舊秩序」的再確認，那麼〈阿Q正傳〉所關切的題旨，不應僅在於對於精神勝利法的批判，而是如何抓住那個突破精神勝利法的契機？汪暉所列出的阿Q的六個瞬間，都是極短、稍縱即逝的，在汪暉的解讀中，正是因為這些契機，而使得中國人投入到中國革命之中，但人也或者死於革命之中。

汪暉認為，「魯迅對於辛亥革命的批判起源於對這場革命所承諾的秩序變遷的忠誠。在魯迅的心目中存在著兩個辛亥革命：一個是作為全新的歷史開端的革命，以及這個革命對於自由和擺脫一切等級和貧困的承諾；另一個是以革命的名義發生的、並非作為開端的社會變化，它的型態毋寧是重複。它的心目中也存在著兩個中華民國：一個是建立在『道德革命』基礎上的中華民國，而另一個是回到歷史循環的另一個階段的、以中華民國名義出現的社會與國家。」¹也就是說，精神勝利法是對於既存秩序的認可、妥協、再確認以重組變遷的失序狀態，因而〈阿Q正傳〉的積極意義正是在於以「突破精神勝利法」作為契機，找到革命之不可逆的關鍵。換句話說，「辛亥革命」並未成為一個徹底的「道德革命」，但在阿Q、未庄人的身上，我們從稍縱即逝的瞬間裡，看見保留革命因子的契機，而這些作為

¹ 汪暉：〈阿Q的六個瞬間——紀念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2011年6月20日），2012年8月27日，取自《人文與社會》：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604>。

「非歷史」的瞬間，對阿Q而言，卻是真實存在於生存慾望、潛意識與直覺之中，正在生成卻也正在消逝。汪暉於是把〈阿Q正傳〉作為寓言，一個對於中國革命的開端的寓言。

區域的亞洲視野

汪暉於台灣講演的「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含納他關於西藏問題、近代國族國家、民族問題、琉球區域問題的思考。

汪暉所討論的亞洲，有一個作為參照點的「西方／歐洲」，但不能將這兩者單純理解為作為「區域範圍」的亞洲與西方。在汪暉的認識中，亞洲在19世紀末以來的幾百年現代化歷史過程中，因為經歷「殖民主義」而產生了與西歐完全不同的經驗，也因此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歷史主體態度。因此，汪暉提出「民族—國家」一概念在亞洲的特殊性：亞洲概念既矛盾也曖昧，既是殖民主義，同時也是反殖民主義的；是保守的，但它的歷史又是革命的歷史；他是民族主義的，但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三世界性質，他又是國際主義的；亞洲是歐洲的相對，因而是歐洲的，但它同時又反過來塑造了歐洲的自我理解，而它的「民族—國家」性質，又是與帝國（前民族國家的區域關係）的視線相互重疊的——亞洲是具體歷史關係的產物。亦即，汪暉提出，在批判與挑戰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時，需要同時進行遺產挖掘的工作，挖掘那些被壓抑的，包括價值、禮儀、制度形式、經濟關係、風俗習慣、文化構成等等屬於亞洲的歷史遺產，這將成為重構「世界歷史」的重要環節。

汪暉對於亞洲概念的討論，包含對於民族國家與市場關係的發展的討論，他認為「國家」仍是促進亞洲內部區域聯繫的主要動力，而區域關係成了國家關係的延伸，即便亞洲區域的主權建構過程始終沒有完成。亞洲的民族國家內部關係的多樣性，以及覆蓋於「帝國」範疇內的多種交往形式（包括超國家朝貢體系、移民網絡等），在這樣的認識上，汪暉提出，在民族國家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政治架構的前提下，亞洲傳統的各種交往與共存經驗，能否提供超越民族國家的可能性。因此，汪暉的亞洲視野首先討論了關於近代亞洲的政治想像，包括解析大亞細亞主義的緣起、革命的列寧主義、孫文的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等。接著，汪暉重探了「前現代—現代」的概念範疇（帝國與國家、封建與郡縣、禮樂與制度），上溯宋代儒學文化史，以從一個內在的視野詮釋亞洲歷史，對當代「東／西」、「中／西」問題提出質詢，它認為這樣的對立佔據主導地位，是歷史形勢的產物，但若將當絕對化，就形成簡化與遮蔽。

而形成汪暉亞洲視野的另一個有機部分，是社會主義革命與經驗以及區域冷戰的現實，這兩部分，汪暉分別藉由討論西藏問題（談西藏作為西方的東方主義幻影，遮蔽於其中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的複雜重構，同時提出共產黨關於民族問題上的「民族區域自治」區的可能性與未完成性）以及琉球（琉球問題所展示的冷戰政治、區域關係與19-20世紀間國際政治規則的轉化，企圖對琉球的社會運動提出歷史解釋）。

汪暉的亞洲視野論述，無論是中國抑或亞洲，帶有些許的文明主義色彩，它的研究取徑雖關切「當代」，但卻不盡然是由「當代」介入以進入「現代」，而是藉由對於「現代性」的研究，開展現代性的多重面目與前現代的豐富性，再重返當代問題。

(二) 以上是對汪暉思想部分的要點。接下來整理對錢理群與王曉明研究中的體會，有些脈絡得交代。

2008年秋天轉學交大，開的課是「亞洲思想資源：魯迅」，基本上延續過去在清華開過的Partha Chatterjee、溝口雄三、陳映真、白樂晴，想要開發不同於台灣學術思想界仰賴歐美的另類資源；特別是閱讀陳映真與魯迅，目的在於重新挖掘、找回屬於中文世界的現代批判傳統，讀魯迅當然也是為了準備接下來的一個學期能閱讀錢理群，讓同學們和我自己能夠在錢先生2009年秋天來講學時有點基礎。

但是，問題來了，我哪裡有能力教魯迅，於是只好硬著頭皮去求教過魯迅的朋友呂正惠教授幫忙，問他課要怎麼開，如何讀起？他滿口答應一定幫忙，結果催了他老兄兩次，都不了了之，我猜原因在於他也很難把握在中文系之外要如何開這樣的課，最後逼得我只好飛揚過海去求助於另外一個好朋友——魯迅專家王曉明。他2008年四月12日回了一封很長的信，分享了他對台灣大學生完全沒有閱讀魯迅基礎，要如何取得文學和思想資源的一些想法，然後提了幾種選材料的方式，還概括了戰後魯迅研究幾個階段的動向²。

最後開課的方式以他的建議為主軸，搭配了很現實的問題——書本能夠容易又便宜的取得，除了建議同學們讀台灣業強版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1992)之外，用了台灣風雲時代版魯迅作品全集(1989)，依序讀了前六冊，《吶喊》、《徬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墳》，每週讀半本，然後按照同學們自己偏好選擇的文章進行討論。本來想接下來要按曉明師的建議讀魯迅後期的《二心集》與三本《且介亭雜文》，都因為時間不夠而作罷。一學期下來還累積了些同學每次寫的心得報告³。

2009年我們請到錢理群先生在新竹清華大學部講魯迅，機會難得，能夠返老還童重新當大學生，當然要去聽課，每週四早上十點準時報到，結果變成每週一次享受知識盛宴的最好時光。課程中的兩點體會是：第一條是，小時候如果聽過這樣好老師的課(精心設計、萬全準備、深入淺出、老少咸宜、唱作俱佳，還外加帶動跳)，後來一定不敢選擇教書這個行業；第二條，當初跟同學們一起閱讀魯迅文本，的確有大用，現在再讀材料基本不陌生，但是立刻發現當時根本沒讀懂，而錢師能夠如此精彩的將文本充分闡釋出來，一方面是他五六十年來的不斷研讀與講課，對魯迅的理解已經到了如火純青、隨手拈來的地步，另一方面則是受惠於戰後大陸魯學成為龐大學術工業⁴，有足夠的基礎讓錢師綜合大家之言，選取最為精細的看法。

整體而言，台灣戰後的知識狀況中，魯迅沒有成為共通的思想資源，這樣的缺席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而魯迅不過是冰山一角，在中文世界中現代批判的、左翼的、有反思性、有深度、有厚度的、有自我懷疑的思想資源都在四九年後的台灣都被拔掉了，雖然留下些許的香火，取而代之站上前台的是一波波流行風潮，從早期的存在主義、邏輯實證論到近期的後學，就連我自己的左翼思想也是來自八〇年代以後依序風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新

² 根據王曉明2008年四月12日的回信。

³ 參見：<http://apcs.nctu.edu.tw/page1.aspx?no=192143>

⁴ 在戰後中國大陸，我懷疑除了魯迅還有哪個思想者受到如此深入的研究。

馬、後馬，有牙齒的也都被拔了，於是五十年間思想變化豐富、飛來飄去，沒留下足夠的積累及有意識的整理⁵，可以讓我們站在上面，向後看、向前看，延續、推進批判思想的傳統。好處當然是大家都沒包袱，無父無母，都很創新，也都很自由的跟遊魂一樣，隨時隨風散去。如何珍惜前面提及的些許香火，重新活化死火，是當務之急。

在此意義下，錢師在台灣後來的一場重要演講該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不但是在創造台灣的批判圈能夠與「魯迅左翼」傳統重新縫合在一起的契機，同時也是給我們一個機會能夠在思想上黏合兩岸的民間左翼思想、民間馬克思主義、民間的現代批判傳統。趙剛以陳映真所代表的左翼思想圈為線索回應了錢先生的講話，此處不再重複，我只能以個人相對熟悉、自八〇年代末期起參與過的思想團體的經驗，進行初步的思考。

相對於中國大陸，左翼的思想與實踐在台灣的命運必然是黨外的，必然是站在被壓迫者這邊的，必然是強調反抗與實踐的，聽起來很魯迅左翼，但是不足的是我們沒有做到（至少是不夠）無情的批判自己，總是防衛性的批判別人，我（們）是對的，別人是錯的，簡單一句：怕輸，這點到最後再說。

從今天回看，四九年後，在全球冷戰、國共對峙、兩岸分斷的情勢下，左翼力量及其思想在台灣被剷除是結構性的因素結果，不是少數人或少數團體的努力能夠扭轉歷史走向的。五〇年代掃紅，國民黨把這些老同學集中到監獄裡，讓他們繼續深化革命情感，今天也才留下了一些活水；曾健民先生的報告，讓我們體會到隱藏在包括學校裡的少數，不是被體制斃命，就是從此封口。至少到八〇年代初期的三十年間，反共、親美、發展主義、威權體制成為凌駕台灣社會的基本原則。值得深思的是，威權體制鬆動的時刻與世界社會主義體制的解體幾乎同步，先是中國大陸七〇年代後期的改革開放，接著是東歐、蘇聯政權的相繼瓦解，這一連串的骨牌效應所造成思想上的作用，是對「黨的左翼」或是黨國左翼的反思，特別是在前殖民地的第三世界，以左翼思想為依靠的反殖民運動，在執政三十年後大都沒法與威權主義脫鉤。讓我大膽而庸俗的說，左翼思想與信念根本沒有在各個社會身體中深入人心，成為生活中的實踐，只不過是對手太弱，一旦快速執政，國家左翼壓根沒準備好，勉強上陣，又沒有深厚的民間思想土壤相連，為了要維繫政權，於是到處搞威權主義，乃至於個人崇拜，這是第三世界歷史的通性。我認為是在那樣的條件下，台灣的左翼思想被迫展開回應，有歷史基礎的左翼力量，因為時代的養成，沒法丟開國家主義思考問題，反倒是我們一些沒有政治包袱的頑劣份子，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際，開始提出「人民民主」的論述，主張與政黨政治保持距離，直接的目的在於支持社會（運動）自主性的建立，試圖透過擴大與深化社會主體性，尋找新的民主生活方式。

錢先生講魯迅左翼傳統，坦白說讓人唏噓，當時如果有魯迅資源做靠山，事情會直接許多，結果我們的思想資源得繞道取自葛蘭西的歐共經驗、Ernesto Laclau 的拉美（阿根廷）經驗、Stuart Hall對英國Thatcherism的批判。人民民主是從英文popular democracy而來，不來自人民民主專政，現在看來是因緣際會的改寫了毛澤東的提案，把黨的人民民

⁵ 例如以陳映真為代表的思想軌跡是我們該承繼的，但是至今因為島內外的政治因素，左翼批判圈並沒有能夠擺脫立即的干擾，認真的、細緻的、批判的、歷史的重新整理出足以承先啟後的思想資源。這是我個人所屬的知識團體，台社，該承擔部份的責任。

主變造成了台灣民間版。那時雖然已經解嚴，魯迅正在走出思想禁區，但是我們顯然沒有基礎與緣分在那個時刻與魯迅重逢⁶。

走到今天，我們當然不能往自己臉上貼金，不要臉的說：台灣社會是在走人民民主的道路，當然不是，但是誰又能否認台灣社會的主體性不斷在加深當中，大大小小的團體林立，紅衫軍政治社會運動的出現，藍綠的能夠相繼更替，難道與社會主體性的強度無關？過去二十年間，黨的左翼，擴大來說，國家主義份子，左也好，右也好，自由派也好，看到台灣政治的整體走向，能不寒心？堅持要夠過政黨政治，搶奪國家機器，才能推進台灣的民主，還能說服任何人嗎？

我的意思是說，在持續了半個世紀（加上日本殖民，該是一個世紀）右翼的政治土壤上生存，作為左翼份子，根本上是不合時宜的，所以早該認命，而要能安身立命的前提就是要認清楚我們「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的批判者，永遠的邊緣位置」，立足黨外，我們得堅持「體制外的獨立性與主體性」。相對來說，我們的條件真的比大陸的朋友好很多，直接面對的不是「黨的左翼」，客觀的歷史條件逼迫我們成為民間左派，逼迫我們看清歷史不要去做什麼執政的春秋大夢，但是也提供了我們在歷史洪流中繼續實踐、繼續累積、繼續反省什麼是民間左派可以做的，至少台灣過去二三十年的思想與運動經驗，絕對可以回過頭來幫助、提攜與刺激在大陸民間左翼的朋友，但是別想要再犯大頭病，認為你可以去介入、去改變對岸的狀況，好好把你自己該做的作好，發揮「泥土精神」：「不怕做小事，切切實實、點點滴滴做建設工作，做苦工」，用錢先生另一種說法，想大事、做小事。把話說的更白，放在世界的範圍內，民間左派難道不該甩開政黨政治的糾纏，站在一起持續對各種形式的壓迫進行反抗？兩岸之間也是如此吧，更是應該站在一起，超克分斷體制對於民眾性所造成的傷害。把話說的更到底，黨國的統也好獨也好，跨海的魯迅左翼，立足民間，總還是得相互攙扶吧。

坦白說，2008年開的魯迅課，上到最後一堂才開始跟魯迅相遇，是在《墳》的後記當中：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很只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地，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真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裡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是也拌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

⁶ 就連屬於同一個陣營中的丘延亮，雖然是透過母親讀魯迅長大，也沒有請出魯迅的幽靈讓我們的精神有所依歸，我猜想當時也沒有條件吧，任何跟中國左翼傳統有關係的都會被快速的打成中共同路人。

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長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而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墳》，時代風雲版，p. 326）

與魯迅相遇的地方正在於：我自己內心深處知道，路該怎麼走其實早已沒有終極的答案，但是確實知道不走不行，現有的路是死路一條、原地踏步，然而會走出什麼樣的路卻又沒法事先知道答案，拿不出個圖像，是對是錯也都超出自己能夠掌控的範圍，在無力改變知識體制的前提下，又清楚知道學生如果走出了體制劃好的框框，最後很可能沒法在逐漸規訓化的專業體制中生存，而對年輕人、讀者也很難交代到底要走到哪兒去。於是，其實擔前顧後，外表篤定樂觀，心中遲疑不定、如履薄冰，得準備隨時滅頂該淹死了結，還是先學會冰泳。

我想，台灣左翼的圈子裡，是否有可能（重新）建立起這樣的文化：因為自己的不確定而多給其他人徬徨、猶疑的空間，而不是大家繃著臉交往，大家來比看誰政治正確、看誰立場堅定，我們須要的不再是過去那種偉大的、高調的、理論的、讓人崇拜的思想。在世界左翼、國際共運退潮之際，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國家左翼實踐給了我們深刻反思的契機，還有誰能夠信心滿滿要我們矇著頭勇往直前？也許正是這個徬徨的年代提供了我們能夠與魯迅左翼傳統重新見面、重新接線的契機，給我們丟掉國家主義包袱的機會，嘗試去追尋在沒有保證、沒有確定未來的前提下拒絕放棄，而這一切要成為可能，就是要能夠創造出客觀的條件，逐漸建立起自我質疑與自我反思的土壤，坦然分享大家心中的困惑與懷疑，或許這是「魯迅左翼」能否在當下重新接合兩岸批判圈最為迫切的命題。

2012年九月王曉明應我們的邀請來交大社文所講授「早期現代思想與中國革命」，目前還在進行當中，他講的「中國革命」是很寬廣的，不只是共產黨與國民黨，比較是具有「革命性的思想」（revolutionary ideas），這些思想大都是被實驗、實踐的，不是光說說。他講課很清楚，沒有夾槓，分類系統內在於那些時代的語彙。搞早期的目的是為了照亮現在的困境，意思是最有深度、內涵的思想，早期基本上都提出來了，反倒是後來經「革命」被窄化。我的體會是：早期的這些思想者跟西方的接觸不深，反而有很清楚的主體性，後來整個知識方式慢慢被「西化」所綁架，非得透過學來得概念與方式來說話，主體性反越來越遠。到了現在，不用西方理論，人們已經認為你沒學問，甚至不是「學術」！我猜想王曉明大概在大陸會被主流學界這樣認為吧，他導論提得都是思想問題，不是我們一般說得「理論」問題，也就會被貶抑。我猜魯迅的根底給了他這樣的知識方式與知識信心，不能不再說一次，這些有思想含量的朋友，大都是研究魯迅走出來自己的路。總之，我覺得他是「同路人」，跟他學習很多。

最後總結性的說幾點以他們三位為代表的大陸思想界的特性。他們三位在年齡上屬於三個年代，錢理群是1939年出生，王曉明是1955年，汪暉是1959年，年齡的意義在於錢先生走過共和國建國後的大小歷史事件，五七、文革、六四，青年時期在偏遠的貴州待過很長的時期，是他的精神家園，至今是他在中國內部看世界的關鍵立足點；王曉明經

歷過文革、六四，做過工人，回校後出道很早，在上海地區桃李滿天下，成為他後來推展工作的基礎；王暉經過文革尾端與六四，六四後曾經有「下放」經驗，但是基本上生命歷程相對平坦，碰上文科開始授與博士學位，在三人中他是唯一有博士學位的一個。雖然都是魯迅專家，我個人認為不同的歷史經驗把他們帶向後來極為不同的工作方式：錢理群的兩大支柱，一是通過教學與年輕學生接觸，即便退休他還去中學講課或是給自願者講課，二是透過寫作噴發自我內在的動力，通過寫作與社會互動，與讀者互動。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比錢先生出版量更大的作者，編的書不算，他自己的專著與文集約有四、五十本，用「出版家」來看待他對自己書的經營，該不為過。在三人當中，他是社會影響力最大的一位。

相對而言，王曉明著作雖少些但至今也有十五、六本，他從文學研究起家向思想界輻射。他最大的特性是，由於人格上的特質吧，他與學生構成的相互尊重的關係，加上他出道早，至今他帶出來的研究生遍佈上海地區主要的高校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薛毅、倪偉、羅崗、倪文尖、張煉紅、毛尖等等，以及在出版界的如王為松，換句話說，上海地區是全中國範圍內思想界少有形成群體的一個，也是因為這些支柱，當九〇年代開始大陸現當代文學界開始專業化，不再是討論當前思想問題的場域時，王曉明藉受上海大學之邀的機會，去上海大學成立中國第一個文化研究機構，試圖打開學界與社會之間的渠道。在上海大學的十年間，他展開了方方面面的工作：通過教學提供分析新視野，通過大型、長期研究計畫試圖掌握社會主義向市場轉型出現的機制，通過刊物《熱風學術》與書系的出版擴大學術的思想性，通過搭建「文化研究」網討論社會議題，通過組織學術會議，演講找回思想的衝擊力，也通過國際的連結把中國問題放在亞洲、第三世界的語境中理解，等等。因為以上的努力，錢理群先生曾經表示這是中國思想界的「南移」，王曉明的貢獻不是他個人的努力，是團隊、團體工作的結果，我認為這是他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支撐著大陸思想界退色的魯迅精神。

汪暉除了在魯迅研究方面延展開來的個人學術成就外，他最大的貢獻在於《讀書》雜誌的十來年間，他與黃平建立起來一個思想界共同的平台，這是東亞地區幾乎少有的狀況，在東亞歷史過程中左右對立、各自為政，《讀書》原來為所謂自由派的地盤，他們入主為主編後，反應了大陸思想界內部的變化，同時他們也努力開了原有的視野與議題，東亞、港臺的作者進入了大陸讀者閱讀的範圍，同時高度社會性的議題如三農問題也成為討論的焦點。這個部分我認為是汪暉最大的貢獻。2002年左右他離開社科院去了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成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近年開始出版《區域》學術刊物，估計目前還在積累中，時機成熟時，在思想界將發揮巨大作用。

整體而言，對於錢、王、汪三人的研究中，讓我們看到大陸思想界三種非常不一樣的知識方式，錢的寫作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最深，汪基本上在學術界內部操作，王則試圖連結學術思想界與社會空間。而三人的共通之處，在我看來，都與魯迅相關，承襲了現代中國知識人在困境中的堅持與理想。換個角度來看，如果拔掉他們三位，大陸的思想界會有些乏善可陳。

最後說一句感想，台灣的思想空間在快速的空洞化與虛無化，而卻又是台灣思想上百

無禁忌的「最好時光」，把兩岸放在一起來看，台灣該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讓大陸批判圈沒法發生作用的時候能夠提供些前進的動力，但是兩邊都需要補課，我們得補魯迅的課，他們得補殖民史的課，才能有真實合作的可能。